

語言學概論參考資料

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

— 1 9 5 6 · 8 —

語言學概論參考資料

目 錄

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	‘俄語教學’社論	(1)
中國的語言學	羅 常 培	(9)
斯大林關於語言的社會作用的學說	И·А·加 里 寧	(20)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		
語言與思惟的關係	А·福斯特利可夫	(27)
論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	德·高爾斯基	(51)
關於概念形成和發展的問題	德·高爾斯基	(74)
論概念的靈活性和確定性	伏·斯捷普科夫斯卡婭	(91)
論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	Б·А·謝列布連尼柯夫 М·М·吉 赫 曼	(106)
關於單一的民族語言	格 拉 馬 尔	(110)
略論語言史和社會史之間的關係	格 拉 馬 尔	(118)
布拉格學派	謝爾文琴柯	(128)
研究方言的方法	С·С·維索特斯基	(135)
就蘇聯經驗談方言研究方法	托 达 叶 娃	(149)
語言學問題講話		
第一 講		(164)
第二 講		(173)
第三 講		(180)
第四 講		(185)
第五 講		(194)
第六 講		(198)
第七 講		(203)
第八 講		(209)

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

苏联『俄語教學』社論

共產党的首創者和領導者，蘇維埃國家的創立者，偉大的列寧逝世已經三十年了。列寧首創的党是強大的，不可戰勝的。共產党的力量和不可戰勝的地方就是，党在建設共產主义社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中，是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为指針的。

我們國家在建設新的社會中所獲得的成就，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和共產党政策的正確性的明証。党一貫遵循着天才的列寧所指示的道路。

列寧教導說，沒有認真的教育，沒有高深的學識，沒有掌握過去的經驗，就不可能建設共產主义，因为共產主义的建設，需要成百万的以人類所積累的文化珍品來充实自己的、各門學問的熟練專家。

列寧把教育和培养共產主义建設者的大任务交托給学校。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決議案的第四章，就是履行列寧關於普遍实施中等教育的遺訓。“在五年計劃終了以前，在各共和國首都、共和國直轄城市，各省的各州的和最大的工業中心完成由七年教育到普遍的中等教育（十年制）的过渡。准备条件在下一个五年計劃中在其他城市和農業地区完全实施普遍的中等教育（十年制）。”

这个規模宏大的方案，就是履行偉大的列寧關於实施普遍中等教育的指示。

俄語的巨大的教育教養意义正在充分地成長着，因为所有科学文化的成就，是憑藉語言起傳授的。

俄語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な語言，成为各种語言汲取最高深的術語和最先進的文化的泉源。

俄語的丰富和有力，要求在教学上須有良好的技巧，在研究上須尽極大的努力。

为要瞭解語言發展的須律性，为要明确語言的基本机能，必須具备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深刻修養。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推廣唯物主义理論到社會現象領域，在他們的光輝的著作中，对語言和思惟的起源，給我們繪示了正确的圖景：語言和思惟是人类社会的發展跟它（發展）的基礎——生產劳动过程所制約的社会現象。

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事業的天才繼承者，深刻的辯証思想家列寧，在他的哲学和歷史著作中，对語言問題相当重視。列寧給語言所下的經典的定义“語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揭示了这一社会現象真正的實質。

不論在語言的实际使用和运用方面，或者是对於語言学問題的理論見解方面，列寧对这些語言学問題都極感兴趣。

在列寧的哲学歷史著作中可以找到深刻啓示的一般理論問題，對於語言学許多問題的解决，有其最重要的意義。

語言学家和所有我們的学者，应当把列寧下面的这一段話奉为金科玉律：“沒有牢固的哲学基礎，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都不能經受得住反对資產階級思想進攻和資產階級觀念复活底斗争。为了要經得起这一斗争並把这一斗争完全勝利地進行到底，自然科学家就应当是現代的唯物主义者，应当是馬克思所創導的唯物主义即辯証唯物主义底自觉拥护者。”〔一〕

斯大林在其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也認為把馬克思主义灌輸到語言学中去是語言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列寧的不朽著作中，語言学家在解决許多語言学問題当中找到了唯物主义的根据和基礎。對於語言科学的順利發展必須解决的一般理論問題之中，应以下列問題为首要：1. 語言和思惟的相互关系問題，不僅是一般的方面而且是个别的問題方面：詞和概念，判断和命題。2. 如何理解語言中形式和內容的問題。3. 語言中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問題。4. 關於語言底符号的和反映的性質問題，關於語言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5. 關於理性、感情和意志在語言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統一和差異的問題。

深刻地研究列寧的著作，將幫助我們正確地對待這些問題的解決，並能以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來闡明它們。

1. 語言和思惟的統一的問題，是在列寧的反映論的啓示下最主要的決定性的問題。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有生物現象和社會現象底唯物主義的解釋，並給予一切觀念論以致命的批判。語言學家研究該書以後，就可以抓住語言和思惟統一的實質。

列寧的“哲學筆記”對於解決這個最重要的問題給以堅固的基礎，並幫助理解詞和概念、判斷和命題的相互關係。

列寧的反映論令人信服地論証說，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早於人的意識而存在，沒有物質，思惟就不可能存在。人的思想是特殊構造的物質——腦底產物。沒有腦就沒有思惟。只有腦能思想，能認識環境。思惟能洞察自然界的秘密，認識它的發展規律。因之不可能把思惟同物質割離開來。但也不可能把思惟和物質混為一談，雖然也不可以把它們对立起來。

思惟是一個過程，其結果是客觀世界反映到我們的意識之中。因之我們的腦具有反映的特性。反映也就是對客觀世界的認識。

列寧教導說，認識通過兩種方式進行：感性的認識，藉助於感覺和知覺；邏輯的認識，藉助於表象、概念、判斷和推理。

邏輯的認識是藉助於語言來進行的。

列寧這樣指出：“感覺的知覺顯出對象，理性給對象以名稱。理性決沒有任何為感官知覺所沒有的東西，但是，凡感官知覺上實際存在的，在理性上僅僅徒有其名……所謂名稱究竟是什么呢？這是用以識別的記號，某種惹人注目的標誌，我把他做為對象的代表，對象的特徵，以想象出對象的整体。”〔二〕

列寧在“哲學筆記”里說，感覺指出客體的實在性，思想和詞指出客體的一般性，任何一個詞（話）都是已經概括了的。

根據列寧的見解，可以明瞭下面的問題：感性的認識沒有詞也可以進行，表象和概念却被概括和被表現在詞中。

關於詞、概念和對象的對應和差異，列寧在其論文“再論職工會、

— 4 —

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錯誤”中做了很令人信服的說明。列寧舉了“玻璃杯”這個詞為例，以辯証邏輯的觀點指出說道：“不可爭辯地，玻璃杯是一個玻璃圓筒，也是一个飲器。可是一个玻璃杯不僅具有這兩種屬性或素質或方面，而且具有無數的其他的屬性、素質、方面，與其餘的整個世界的相互關係和‘媒介’……”〔三〕列寧還指出玻璃杯的許多屬性及其可能的用途。

從列寧關於“玻璃杯”的議論中，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詞和概念相適應，概念和詞是統一的，同時又是不相同的。

2. 語言中形式和內容的問題並不是次要的。

列寧在“哲學筆記”里寫道，形式是本質的，而本質轉化為形式（142頁）。語言的本質即它的內容是通過形式來表現的。語言本質的表現，這就是語言內容的顯露。

沒有形式一般說不可能有任何的東西。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反正都是定形了的物質。我們應當以這樣的觀點來對待語言。

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學說，在形式與內容的辯証的統一中，我們應當在產生其固有形式的內容中看見主要的應份獲得的東西。我們分析了語言以後，應當認為形式幫助其內容的成長，但內容可以超過形式，因之開始“內容同形式的鬥爭，以及相反的，形式同內容的鬥爭。拋去形式，改造內容。”〔四〕

斯大林在其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里，對形式和內容的學說有巨大的貢獻。

上述的原理對於語言學家是非常重要的。語言本身的發展，各種詞類的發展，可以而且應當完全運用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形式和內容的學說加以論証的。

在形式和內容脫離的基礎上引起詞義的發展，在形式和內容脫離的基礎上引起詞類的發展，引起由一種詞類到另一種詞類的轉變。

正確理解語言中的形式和內容，就能較深刻地分析作家的語言，就能較明確地理解藝術作品風格的不同，就能明瞭各種藝術作品的風格及其內容所以彼此不同的原因。

內容愈正確深刻，形式就愈完善。內容愈生動，形式愈特出。內容

愈密切合实际，形式就愈明白易懂。因为本質轉化为形式，而形式是本質的。列寧著作的內容之所以能體現於这样完美的形式，是因为各种現象的內容底真正本質是通过列寧的語言而被揭露的。列寧說过：“我們的傳宣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不是因為我們已成為甚么高明的宣傳家：我們的宣傳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祇是因為我們所講的是真理[五]。”

關於列寧的語言，斯大林曾說过下面的話：

非常大的說服力量，簡單明瞭的論据，簡單通俗的語句，沒有半点矯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点令人昏眩的手勢，不用半句故意刺激听众的辭藻——所有这些，都使得列寧的演說比通常“國會”演說家底演說高出万万。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寧演說底这一特点，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种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这演詞虽然是較为乾燥地，但是着实地抓住着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虜得所謂精光光。我記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这样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种万能的触角，好象是用蟹子从各方面把你鉗住，使得你無法逃脫出去：你不得俯首想投降，就要完全失敗。”〔六〕

我們偉大的思想家，世界劳动人民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語言是不脱离事实的，他們的語言的形式是適应其內容的，而語言同思想脫節，因之也就是語言不符合事實的情況，則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言辭里。列寧曾屢次地指出他們語言同思想、言辭同事实的脫節。在“論言辭底弊害”一文中，他給小資產階級政党詭辯家底謊言打上烙印，“伪善的口吻”一文論可恨的謊言与“清談”；“激怒的惶惑”一文，揭穿孟什維克的“言不符实”；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他按照布尔什維克方式，清除了語言的伪科学，故弄玄虛的術語，自我炫耀的时髦字眼和一切的“主义”。

3. 列寧的著作，特別是“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和“哲學筆記”，对語言中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相互关系問題，也做了明确的暗示。为要理解作家語言中个人因素和全民因素的关系，为了理解許多語言的范畴如入称、时制、式、語气意义等，这一个問題是必須正确地解决的。

在列寧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解决這些問題的根据。列寧对这

些複雜的問題的解釋，是根據其關於人對周圍世界感覺過程底深刻的唯物主義理解而出發的。

世界是客觀的，而且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着。它是由我們的腦所反映的。人在思惟過程中，可能會不恰當不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的現象，因為感覺和知覺是客觀世界底主觀形式。祇有那些經過社會實踐所驗証的才是正確的，客觀的。

思惟的客觀性，這就是概念和事物的一致。既然語言被認為是現實的實際的意識，那麼，語言就猶如思惟一樣可能兼有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

語言中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概念是未被通曉的未被區分未被闡明的。語言學的某些問題的解決，還缺少唯物主義觀點。

4. 關於把詞理解為反映或符號的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

列寧以認識論的觀點批評了把概念當作表象的見解。列寧極其反對普列漢諾夫底認識中的象形文字論，因為這一理論懷疑我們感官的知覺，帶着不必要的不可知論的因素。

在所謂語言“新學說”統治時期，語言學家會把列寧的這一批評從認識領域搬到語言方面，而且開始教導說：詞也“反映”實際現象。但是，如我們所知，現實是由我們的腦所“反映”的，其結果是我們的概念得以構成。概念實際上是模型，是現象近似準確的反映。但詞不可同概念混為一談。詞是外殼，是概念底綜合和表現的形式。作為概念之表現的詞，不是任意的，假定的，也不是故意造作的。詞是對實際事實的概括認識底社會的表現。所以詞在思惟方面不可能祇是符號，但是詞的發音方面可以充當對象，事物或動作的符號且為社會所公認。所以，詞整個地是不可以認為是符號的。另一方面，不可以認為詞“反映”真實現象恰如腦那樣“反映”它們。這一問題的正確解決在這種情況下也是依據列寧的著作的。

5. 列寧關於認識底感性的和理性兩個階段的統一和差異的學說，給予正確理解語言中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的可能。

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它們在人之中是統一的。在語言里，也不可以把它們分割開來，因為語言所表現的不僅是思想，

也有感情、願望和意向。人在表現自己的思想時，同時還感情地將自己的思想加的渲染。人在表現感情時是意識到它的。列寧在關於盧巴金的著作的“書評”一文中，指示作者說：“如果‘沒有人類的感情’則從來不會，現在不會而且將來也不会有人類對真理的‘探求’”現實的認識總是或多或少地伴隨着感性的知覺和感性的評價。在語言里，不僅在認識的過程，而且在交际的過程里，感動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正如不可把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割裂開來一樣，同樣也不能不看見它們的差異。不可以把理性因素歸結到感性因素去，甚者在兩或之間划上等號。在語言里同樣也有兩者既不可分割又不可混同的現象。

在語言里，感性事實和理性事實的混淆，一方面造成在分析這些事實時的大錯誤，有如感嘆詞同其他詞類的混淆，各種不同的小品詞的混淆，妨礙語言中語氣詞義的正確發揮等；另一方面，言辭中理性事實同感性事實的混同，妨礙對句子的不同類型性的理解，妨礙着表达見解的句子和表現情緒和意向的短語、特殊句子的區別。

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里指出，思惟、感情和意志是在一起表現着的。因為語言也是斗争的武器，因為語言所表現的是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所以語言在社會生活中，在政治斗争、各種思想斗争中，獲得了最重要的意義。

作家為人民的理想而斗争的文藝作品中的語言，其感染人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在巨大的社會運動的年代中，在全民動盪的年頭，語言的力量尤其是有效。在為祖國為俄羅斯文化為愛國主義感情和民族自覺的覺醒而激烈戰鬥的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俄語變成為在和法西斯侵略者鬥爭中最犀利的武器。作家和詩人，描繪出蘇維埃人性格的最好的典型，描繪出他們的大無畏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的勇敢和大膽，同時培養了高度的愛國主義感情，為反對遲鈍、暮氣、反對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反對小市民的傷感情緒而斗争。

語言的力量使人民成為牢不可破的團結一致，語言的力量培養剛毅和堅定，培養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對黨的忠誠。

作家越接近人民，越珍視人民的利益，越明確全民的目標和任務，那麼他的語言也就越是人民的語言。作家的思惟體系越是邏輯的，那麼

他的語言就越富於說服力。作家的感情越丰富，他的語言就越特出，越富表現力。作家的意志越堅強，他对义务和必要性的概念的語言表現就越肯定。

在人的性格中理性、感情、意志的和諧一致，也同样和諧一致地表現於語言中。作家性格上思惟的正確性、感情和強烈性和意志的堅定性表現在他的語言底鮮明表現力和深情感入中。偉大的作家和政論家的語言之所以是这么有力的影响群众的武器，是因为他們的語言中和諧地統一着高度的理智、堅強的意志和深刻的感情。

列寧自己的語言，就是应当仔細加以研究的这样和諧的語言。列寧的著作和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教導我們这样地理解語言。

列寧曾指出報紙的語言和政論作品的語言應該怎样，指出它對我們优秀作家的語言的关系，他的見解幫助我們解決語言的規範化問題，幫助我們理解適合我們時代任務的風格。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苏联語言学者，正以新的力量走向苏联唯物主义語言学更新的成就。

(多明譯自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俄語教學”)

- [一] “列寧全集”33卷207頁：“論戰鬥的唯物主義底意義”。
- [二] “哲學筆記”，320頁。
- [三] “列寧全集”，第32卷，71頁。
- [四] “哲學筆記”，193頁。
- [五] 克魯普斯卡婭：“作為宣傳鼓動家的列寧”。
- [六] 斯大林：“論列寧”，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1949，28頁。

中國的語言學

羅常培

本篇簡略地敘述中國歷代關於語言的理論和著作，近几十年來的成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語言學的新方向，斯大林同志語言學著作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

中國古人對於語言的看法——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有最豐富的文化遺產。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語言學這個名目，實際上也做了不少語言學方面的工作，在古書中常常可以看到關於語言的理論，雖然是片段的，可是非常精采。現在舉幾個例子來說。

戰國時的大哲學家荀子（約公元前三三五——二五五）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者謂之不宜。’（荀子正名篇）三國時候的嵇康（二二三——二六二）說：‘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号。举一名以為標識耳。’（嵇中散集聲無哀樂論）〔一〕用現在的話來說：在起初定名的時候，名稱跟事物的關係是偶然的。換言之：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字音跟字義只有事實的關係，沒有必然的關係。這是語言學的重要原則，認識這一點，我們才能比較語言，研究語言的親屬關係。

東漢的哲學家王充（生於公元二七卒於九八——一〇四之間）說：‘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語言同趨。……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音殊，四方談異也。’（論衡自紀篇）他很正確的說明語言文字的關係；古書難懂的理由是古今語言有變遷，又有方言的差別。這是語言學的基本原則，認識語言是演變的，我們才能研究語言的歷史，語言的發展，古書的註解里，常常有古今詞彙不同，語言不同的話。例如：東漢末年鄭玄（一二七——二〇〇）的周禮（春官外史）注說：‘古曰名，今曰字’；毛詩（第一五七篇東山）箋說：‘古者聲栗烈同’。跟鄭玄同時的劉熙在他的釋名（釋車）里說：‘車，古者臼車

声如居，……今日車声近舍。’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學者已經認識語言是變的。

訓詁——訓詁就是解釋古代的字義，主要是注解古書。現存經典的註解，可以追溯到漢朝（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漢朝最有名的經學大師鄭玄所作的詩經、周禮、儀禮、禮記的注解，都是很重要的著作。漢朝以來，歷代學者都有很好的成績。陸德明（約五五四——六四二）的經典釋文（五八三），孔穎達（五七四——六四八）的五經正義，都是總結前人意見的著作。哲學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也註集了好些古書，如詩集傳、論語集註、孟子集註、楚辭集註。陸德明、孔穎達以及其他唐朝（六二〇——九〇七）的學者偏重字義的解釋，朱熹以及其他宋朝（九六〇——一二七九）的學者偏重內容的發揮。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的學者在訓詁方面成就最大，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經典，都做了新的註解。除了注解古書以外，在字義方面，還有許多獨立的研究。其中最特出的是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王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王念孫的兒子）。戴震的詩經補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的讀書雜志、廣雅疏訛、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在古代字義研究上都有卓越的貢獻。清朝以前，古書的注解主要是隨文解義，訓詁只是為解釋古書用的。清朝學者對字義有精深的研究，無論自己著書，或者替古書作注，都有成系統是獨立的見解，訓詁才成為一門學問，這一點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對古音學有修養，所以對古字義有深刻的認識。〔二〕

字典——中國字典可以按體例分成四種：（一）沒有注解的分類字彙；是識字課本性質，（二）有注解，按意義編排的字典，（三）有注解，按字的偏旁編排的字典，（四）有注解，按字音編排的韻書。這四種體例代表字典發展的四個階段。第（四）項留到下節討論，本節先討論前三項。

（一）沒有注解的分類字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紀的史籀篇，現存最古的是史游（公元前一世紀）的急就章。更早的都不存在了，只能從古書的引語和新發現的漢代木簡上找到一部分。這種字彙編排的次序

一部分根据字的偏旁，一部分根据意义，并且編成韻語，便於記誦。后代有不少这类的識字課本，如周易圖（四七一一五二一）的千字文，和各地流行的‘雜字’之类。

（二）按意义編排的字典，最古的是爾雅，相傳是周朝初年周公（公元前十一世紀）所作。這說法不見得可信。根據穩健的估計，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紀編定的。爾雅共分十九章。前三章占全書的三分之一，是字義的解釋，大部分把义同义近的列為一条。第四章至第十九章是事物名称的分类，如‘天、地、山、水、草、木、鳥、獸’等。後來摹倣爾雅的書很多，最早的是魏（二二〇——二六五），張揖的廣雅，書名的意思是爾雅的擴大或補編。

揚雄（公元前五三——公元一八）的方言是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書，也是按意义排列的，其中大部分詞彙注明通行的区域，哪些是全國通行的，哪些限於某些地方。他的材料來源有古代的典籍，有直接的調查。二千年前就調查方言，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其中方言的不同大多數是詞彙的不同，例如：‘舟，自（函谷）关而西謂之船，自关而东或謂之舟，或謂之航。’也有一些可能是同一个詞在不同地区里的不同讀音，例如：‘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曰迎。’逆字迎字古音相近，都是迎接的意思。后代摹倣方言的書也不少。

劉熙（公元二世紀）的釋名是一種分类字彙，共二十七章，包括‘天、地、山、水’等，書中用音同音近的字來解釋字義，想用這種方法來推究事物得名之由，所以叫做‘釋名’。例如：‘冬、終也。’終是末了的意思，冬是一年的末了，所以用‘終’字來解釋‘冬’。這種解釋字義的方法有時候免不了附會，不過利用它音同音近的材料，對於推測當時的音韻，倒也有一些幫助。

（三）按字的偏旁編排的字典始於許慎的說文解字（公元一〇〇，簡稱說文）。這是有意識地編成的字典。全書分成五四〇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其中大部分是形聲字。形聲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形，跟意義有關，多半是說文解字的部首，例如：‘江，河’都是水字旁，都在水部。一部分是聲，跟讀音有關，例如：‘江’字从‘工’聲，‘河’字从‘可’聲。說文解字部首次序大部分跟形體有關係。唐宋以

來說文解字是研究中國文字的主要參考書，十七世紀以後研究的人更多，講說文解字的專書和論文合起來有几百種。說文解字以後按部首編排的字典非常多，其中特別著名的是顧野王（五一九——五八一）的玉篇（五四八），共一六，九一七字。原書注解列舉書中实例，體例非常完善。可惜現在只存在一部分殘卷。現行的玉篇是陳彭年等在一〇一三年改編的，分部大體根據說文解字，共有五四二部，二二、七〇〇多字。梅膺祚的字彙（一六一五）依據說文解字，歸併部首，共二一四部。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成書於一七一六年，共收四七，〇二一字，分部就是根據字彙的，到現在還有許多人用它。近几十年出的字典，通行最廣的是辭源、辭海，單字沒有康熙字典多，分部同康熙字典一樣，除單字外，特別着重典故和成語的解釋，並且包括很多新的名詞。

音韻學——公元二〇〇年以前，字典和古書注解的注音，都用音同或者音近的字來比擬，不容易說得明白準確。公元三世紀發明了反切的方法，把每個字的音（一個字是一個音節）分析成三個部分：（一）起頭的音（‘聲韻’）（二）其餘的音（‘韻母’），（三）全音節的音高（‘聲調’）。反切用兩個字來表示一個字的音，上字表示被切字的‘聲母’，就是跟被切字‘雙聲’；反切下字表示被切字的‘韻母’‘聲調’，就是跟被切字‘疊韻’。比方說‘耐’ naï，‘奴’ Hy‘代’ Дай切，耐奴兩字的聲母都是 aH，耐代兩字的韻母都是 aй 耐代兩字聲調都是去聲。从此以後無論甚麼字都可以用反切注音。就漢字這種非拼音的文字而論，用反切注音的方法是比較簡單準確的。現代的語言學家認為，分析漢藏語系的語言，每個音節分成這樣三部分是最方便的。

有了反切，才有按音編排的字典，就是韻書，最早的是魏（二二〇——二六五）李登的聲類，其次是晉呂靜的韻集（公元三〇〇年左右），現在都不存在了。最重要的韻書是陸法言（-陸詞）的切韻（六〇一）。切韻的序上明白地說，切韻不僅是實用的書，也是審音的書。（三）切韻流行全國，有許多增訂本。最晚的增訂本是一〇〇八年的廣韻和一〇三七年的集韻。切韻原本已經不存在，最近發現許多唐人抄寫本，其中有一個王仁昫的增訂本（七〇六）是完整的。（四）切韻系韻書在中國語言學上地位非常重要。研究現代漢語，可以拿切韻的系統來說明各方

言的語音變遷和方言之間的關係。研究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也得從切韻往上推。

有了韻書才有韻圖。這是一種表格，同一直行表示聲母相同，同一橫行表示韻母跟聲調相同。這種韻圖可以表示整個音韻系統的全貌，聲韻配合的關係。現在的語言學家認為，要描寫漢藏系語言的音系，這種表格是不能缺少的。韻圖大概在九世紀就有，不過現存韻圖最早是十二世紀的。大歷史家鄭樵（一一〇四——一六〇）的通志七音略是根據切韻系韻書的；同時代的切韻指掌圖却根據當時語音加以調整。以後出現的韻圖不外這兩部書所代表的考古和審音兩派。

因為語音的變遷，切韻系韻書無論如何改編，都不能表示當時的語音系統，非有新韻書不可。一三二四年出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一三七五年出版了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等人編的洪武正韻。中原音韻沒有濁塞音聲母（如 Б, Д, Г, ），入聲不自成一类，與現代大部分官話相近。洪武正韻有濁塞音聲母，入聲自成一类，與現代吳語相近。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等人編輯的經籍纂詁（一七九九），把古書的注解分字收羅，按韻編排，是很有用的參考書。近年出的韻書，最主要的有國語辭典，除單字外，多收白話及現代常用的詞。

古人雖然知道古今音異，可是有系統的究古音是从吳棫（約一一〇〇——一五五）開始的，他著了一部書叫韻补。古音的研究清朝有飛躍的進步，我們舉六個人來說。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是生於明朝卒於清朝的，他研究音變歷史，特別着重每一种音韻現象最早出現的時期，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首先指出諧聲字同一声符的字在詩經用韻里是可以通押的。換言之，諧聲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是符合的，我們拿這兩種材料當作內部一致的材料來研究沒有多少例外。根據這兩種材料，就可以把上古音的韻母分成好些部。上古音的分部工作因此就越來越細密，到王念孫（一七四四——一八三二），江有誥（一八五一年卒）几乎已經到了頃點，可以補充修改之處已經不多。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四〇）是第一个研究古代聲母有成績的，首先証明古音沒有齒音（例如 Ф·В），只有牙唇齒音（例如 П·Б·Н）。陳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著切韻考（一八四二），研究反切的系

統，分析切韻的聲韻，他的方法和結論，用今天的語言學的眼光來批評，基本上都是站得住的。

外國語言的研究——公元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中國人接觸到結構跟漢語完全不同的梵文，翻譯了大量的佛經，保存了無數印度已經失傳的典籍。同時梵文的研究對中國音韻學也起了影響。梵文字母按照發音部位發音方法排列，是最科學的。反切已經分出字音的聲母和韻母，可是聲母的系統排列法是唐朝一個和尚守溫（九世紀）參考梵文定的。印度教兒童審音識字用的悉曇章，對韻圖的產生也是有幫助的。

十九世紀起，中國人研究歐洲語言的漸漸多了。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對拉丁文很有研究，他寫出了第一部漢語語法——馬氏文通（一八九八）。在他以前也有討論虛字用法的書，可是有系統的語法這是第一部。

從上一節我們可以看到，歷朝歷代的中國人，有很多敏銳的語言學家。不過因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們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語音分類跟語音當中的關係，比較忽略語音本身的音值。好些古代學者的著作，要等待現代語言學家作語音學的解釋。中國人接觸了分析音素的歐洲文字，掌握了分析音素的工具，語音學大有進步，同時語言學也大有進行。

近几十年來，中國語言學家研究的範圍不限於中國的語言。關於印歐語，也發表了好些論文。亞洲各國的語言，中國人向來很關心，如越南語中的漢語借字，印度尼西亞語的語法，都有著作發表。

近几十年的工作——近几十年來的工作，主要的是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漢語語法的研究，漢語歷史的研究，漢字改革研究，漢藏系語言的調查研究。本節先討論前三項。

中國的語言可以分成三個大區域來說。東南各省的方言最複雜，這一區域包括廣東、福建、台灣、江西、浙江五省的全部，湖南省的大部分，廣西、安徽、江蘇三省的一部分。第二區是‘官話’區，包括長城以南不屬於第一區的各省，跟東北的大部分。換句話說，長江以北及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的漢民族，說的全是‘官話’。第三區包括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以及西南各省的邊地，說的是不同民族語跟‘官話’。這一區土地差不多占全國的一半，人口却不到全國的十分

之一。漢語的方言可以分成九組，第一區六組，第二區三組。第一區的六組是粵語、贛客、閩南、閩北、吳語、湘語。第二區的三組是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北方官話包括黃河流域和東北，北京話屬於這一組。官話同特点是音系比較簡單。說各組‘官話’的人，他們之間可以隨便談話，各的共人用自己的方言，用不着太遷就對方。漢語方言的區別，主要是音系不同，其次是詞彙，語法的差異最少。

北京話可以說是全國的共同語，音系語法都有好些專書。全國方言，曾經作比較廣泛調查的有江苏南部、浙江、廣東、廣西、江西、湖南、湖北、雲南、四川、安徽南部、陝西中部等處，已經寫成報告發表的很多。

漢語語法有系統的研究始於馬氏文通，不過這部書講的是古文的語法，以後出版的語法書和單篇論文很多，有講古文的，有講口語的，有比較古今語法的，對漢語句法結構有比較精密的分析。漢語的語法，最主要的是字序和結構的層次。向來大家都知道字序在漢語中的主要性。還有一點同樣重要的，就是漢語的句法結構可以一層套一層，任何一種結構當中都可以包含別的結構，不必用好些連接成分。只要認清層次，條理就非常清楚。例如：

他 || 不來。

他 || 很好。

(他 || 不來) || 很好。

‘他不來’是主謂結構當主語用，‘很好’是謂語。

我 || 看見他。

我 || 看見 || (他來了)。

‘他來了’是主謂結構當賓語用。

我們 || 反對 || 美帝國主義。

我們 || 反對 || (武裝 | 日本)

‘武裝日本’是動賓結構當賓語用。

我們 || 反對 || (美帝國主義 || 武裝 | 日本)。

‘美帝國主義武裝日本’是主謂結構當賓語用。